

# 拆迁普店街：

## 二十世纪末中国都市小说中摧毁和复兴主题的含混

李 侠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most cogent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has been realised in big city fiction and cinematographic masterpieces such as Fritz Lang's *Metropolis* (1926). Despite the formal and aesthetic incompatibility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redominantly Western) works of this literary genre and more recent ones, East and West, the underlying dialectic tension between progressive optimism and disorientation, existential up-rootedness, alienation and angst (Rilke's loss of soul) as archetypal manifestation of mega-city reality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sation, constitutes a generic hallmark, regardless of time and place. Significantly, the relevance of this problem is reinforc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by the eminent scholar and architect Rem Koolhaas whose reflections have China as a principal reference point of the global "out-of-control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ex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problem and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blurred and ambiguous vision of urban reali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最近五十年的发展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都要快。这一发展过程富有象征性的标志是现代都市的出现。城市发展在世界各地的速度和强度都各有不同，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大陆和文化不受到它的影响和冲击。

作为一个新现实的象征，现代城市在二十世纪初就吸引了很多西方主流作家的兴趣和关注；作为创作主题也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和多方面的探索。这集中反映在里尔克的《毛地日记》、帕骚斯的《曼哈顿枢纽》、多伯林的《柏林亚力山大广场》、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等作品中，以及艾略特长诗《荒原》中被诗化了的伦敦的凄凉和暗淡景象；也有拉什迪八十年代发表的《午夜的孩子》等。<sup>1</sup> 佛里兹·朗的经典无声幻想影片《大都会》，<sup>2</sup> 以其对一个

---

<sup>1</sup> 里尔克，《毛地日记》，1945年版；帕骚斯，《曼哈顿枢纽》，1925；多伯林，《柏林亚力山大广场》，1929；乔伊斯，《尤里西斯》，1922；艾略特，《荒原》，1922；拉什迪，《午夜的孩子》，1980。本文所有详细索引请见文末参考书目。

<sup>2</sup> 佛里兹·朗 (Fritz LANG)：《大都会》 (*Metropolis*)，纽约基诺国际电影制片厂，1989年出品。

高度机械化的未来都市具有恐怖色彩的描写和意象，为我们提供了二十世纪初人类对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高度发展在生存上的焦虑和危机感的艺术表现，即都市书写（包括不同形式的以都市为主题的小说和叙事）。可以说无论在本杰明的意义上还是在库哈斯的具有纲领性的“典型城市”的蓝图里，都市书写都充满矛盾、困惑和主题轮廓的模糊，<sup>3</sup> 这突出体现在人类对现代文化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与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世界末日般的现实的冲突和不相称上。

以上每部作品都是经久不衰的代表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就人类对现代城市及其内在固有的破坏性的经历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并将这种艺术探索放在创作主题和结构的突出位置，由此形成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探索。在里尔克作品中被诗化了的 1902 年的巴黎是一个异化的文明和死亡的景象，尽管她表面上充满活力和对生活的渴望与追求。里尔克将其归结为人类自然生存节奏的消失和与其相关的对生活的立刻的、伸手即来的满足的无节制的追求：“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动力吗——是生活本身吗？生活本来是安静的、有宽度的、朴实的。而这里生活的动力是急促的、无限制的追求。这种对生活的张狂的欲望，对生活全部的立即的、一小时内就得到满足的欲望：这样的生活巴黎比比皆是，所以她接近死亡。她是一个如此异化的城市。”

4

里尔克在一百年前对城市文明的异化的具有诊断性的洞察，在一百年后仍具代表性和说服力。其实，在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的日益加剧，及其导致的与自然和谐的逐渐丧失的今天，更具有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新月异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日趋完善的建筑业，如摩天大楼和日趋复杂的地下工程、以现代交通为代表的城市组织和发展、人口政策—城市空间的超负荷使用，以及日趋职业化、自动化的社会和私人生活等）是以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的破坏和与自然亲合力的逐渐消失为代价的。多种精心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电脑游戏及大众性体育活动人为地使居住在城市荒原中的人们感到充实起来。

以上所列举的都市书写在风格流派上自成一派；从形式上看，它们可谓最富有创新和实验性的西方小说，当然也包括电影。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大陆作家也从诸多的方面展示了城市生活，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的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在写作技巧和深度方面，还不能和以上所提及的西方作品同日而语。但正如西方同类文学实践一样，以关注都市现实为创作主题的主要文学形式在中国也是小说。正如评论家张英进所说：“就文学形式而言，小说比戏剧和诗歌更

<sup>3</sup>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95、1087 页。

<sup>4</sup> 里尔克（Rainier Maria Rilke）：《毛地日记》（*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M. D. H. Norton 译，纽约：诺顿公司，1945 年版。第 47 页。

得到认可，因为现在中国的城市问题在极大程度上，是在小说里被首先问题化的。”<sup>5</sup> 在这里，张英进也很恰当地谈到了中国诗歌对城市生活的探索。<sup>6</sup>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不处于领先地位，<sup>7</sup> 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及其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使中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大连、青岛等地。<sup>8</sup>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和上海作为珠江和长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龙头，以其典型的后现代建筑和布局吸引了国际著名建筑家的注意。在谈到建筑风格时，库哈斯借用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著名小说《没有个性的人》，<sup>9</sup> 将深圳称为“典型城市”或“没有个性的城市”，并将其选为他在哈佛大学建筑学院高年级班的一个特殊研究专题中的城市之一。<sup>10</sup>

库哈斯认为，这种“典型城市”的最终原型是新加坡，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亚洲城市都更具有西方城市的特点，或者以他的原话，是“一个失控的现代化过程的受害者”，或者说是“殖民主义的最后一次体面的痉挛。”<sup>11</sup> 但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典型化在于它是自我宣称的中国建筑模式的实验室：“事实如此，新加坡的模式，正象我们所见，是一系列系统性的变质体的综合。这实际上使它成为城市化最具意识形态象征意义的城市之一，而且正在向亚洲各地传播。其组织形式的魅力、其取代和根除异物的效率、其对人口改造的成功、其对自身过去的梳理及对本土文化的控制，为那些比它多数千万人口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想像、建筑、策划新的城市环境的不可抗拒的模式。越来越重要的是，新加坡将自己称为中国大陆的实验室，这一角色会使它从眼下的郁闷中解脱出来。”<sup>12</sup>

毋庸置疑，新加坡式的城市化模式的产生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由工业化和农业人口的流动所造成的人口问题，同时也是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所必需的。<sup>13</sup> 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所导致的人的离异和失落感，可以从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孙力和

<sup>5</sup>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xvii页。本文章所有该书引语均为本文作者所译。

<sup>6</sup>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sup>7</sup> 若兹·摩非（Rhoads MURPHEY），《上海：现代中国的关键》（*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sup>8</sup> 戴锦华：《隐形书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1999年版，第31-57页。

<sup>9</sup>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汉堡若沃特出版社，1952年版。

<sup>10</sup>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5、1087页。库哈斯在中国最著名的设计是中央电视台新总部（2002年）和广州歌剧院（2002年）等。

<sup>11</sup>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3页。

<sup>12</sup>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7页。

<sup>13</sup> 在新加坡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历史已几乎完全被抹去。人们唯一能够看到的历史痕迹是刻意镶嵌在建筑上的装饰物。这里唯一可以认出的“历史”是作为英国殖民象征的拉福兹饭店。这个豪华饭店最近在耗资数亿元后，被“克隆”到了它殖民地时期的辉煌。现存的原唐人街的一小部分也是因为规划失误而免遭推土机的清除。

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所看到。<sup>14</sup> 笔者认为，《都市风流》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的比较成功的文学表现。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对社会每个利益集团和阶层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特别是旧势力的维护者和改革倡导者之间的斗争，全景式地刻画了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和心态。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普店街拆迁工程实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毫无疑问，普店街拆迁工程是中国现代城市化过程的一个缩影。这个旨在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工程在开始的时候受到居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普店街的拆迁，是道路改造工程拆迁任务中最大的一项。它意味着这片几乎与这座城市一起诞生的、拥有三千多户的居民区从此在这座城市版图内的消失。取代它的将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立体交叉桥和环桥耸立的新型商业区。规划者们充分表现了自己惊人的雄心和气魄。而这里的居民呢？普店街的居民在希望中等待着搬迁动员令的下达。人们要求改变生活环境的愿望远远大于对这个居住了几十年，甚至几辈子的地方的留恋。两个星期以来，各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集中宣传改造市里交通的必要性。居民们意识到，市里交通改造和自己居住条件的改善指日可待。”<sup>15</sup>

但是，这种由外国投资和政治野心所驱动的搬迁不仅仅代表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善意，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对传统生活的破坏，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自身生存环境和文化的离异和失落感。这种情感和精神家园的丧失，可以在书中从海外归来的柳若菲在普店街寻找她失去的家园时的感觉所看到。“她在寻找那条窄小的胡同和那个拥挤却是温暖的家。然而，她站在这儿，却惊呆了。普店街消失了。她的眼前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一座宏伟壮观的立体交叉桥和大桥两旁高耸的建筑群，以及桥上衣着新潮、鲜艳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接她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sup>16</sup>

与这种象烟云一样比比皆是的离异和失落感同时发生的，还有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为由的大刀阔斧的拆迁和建筑。城市居民们被压抑的、对过去的乡村生活的留恋和他们对城市生活所感到的禁忌和束缚象一条红线贯穿着整个小说，这明显体现在建华的母亲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和因她难以逃脱的这种困境所带来的烦恼：“妈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从小他就听母亲对农村那些往事的回忆，那里人好，天也好，地也好，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掉。为什么不能去内蒙呢，那儿有的是地，种菜、种豆、养猪、养鸡，可由着性子来。”<sup>17</sup>

城市人的这种对过去田园式的生活的眷恋和向往当然并不新鲜，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学、文化和思想体系中，而且在大批农村人口被那些决定命运的发家美梦吸引到大城市的今日中国，

---

14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16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17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应该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与我们的生活更息息相关的话题。不可否认，农村生活在中国文学中，从过去到现在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要比对中国农村来说仍然十分陌生的城市生活重要得多。众所周知，对于绝大多数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来说，农村自始至终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心，”虽然这一点在历史上某些阶段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年来发表的论著中，有些评论家指出，中国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艾青、郁达夫、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和沈从文，只有老舍、巴金、曹禺和施蛰存出生在城市，而且他们当中只有几位写过“令人难忘的城市叙事”。<sup>18</sup> 对沈从文来说，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生活不过是一种囚禁和流亡，导致了他在以城市为主题的小说中的“报复心理”。<sup>19</sup> 沈从文在他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反思中，将北京和上海进行了对比，并将北京和上海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心态进行了探索。他所表达的观点和叶文心的观察多有雷同：“北京代表了上层文化和绅士官员的优雅，上海却是时尚、华丽、装饰、耀眼的商业中心，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sup>20</sup> 这一观察与徐吁把“自然、纯朴”的北京乡下生活和充满“机械化和理智”的大都市上海的对比不无巧合。<sup>21</sup>

毫无疑问，农村对城市生活和价值观的怀疑和不满及城市对乡村生活的暗中的向往，象一条主线贯穿于大多数中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当中，这特别包括那些长期参加城市建设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当权人物。这种怀疑和不满在王蒙八十年代所写的中篇小说《蝴蝶》、诗人顾城的诗歌及小说和杨炼的作品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尽管后者出生、长大在北京，并在西方大城市游历多年。<sup>22</sup> 其实，这种怀疑和不满导致了很多评论家将这种“对农村问题的固执的关注”看成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文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电影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们的“多样化”：“伤痕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第五代电影”只是 1976 年以来中国文艺现象的几种。尽管他们是多样的，但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文学所表现的是对农村问题的固执的关注。”<sup>23</sup>

但是现阶段城乡对立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的流动。这一主题即没有得到严肃文学的重视，也没有在通俗文学中受到应有的处理。在谈到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流时，

---

18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 年版，第 87 页。

19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77 页。

20 叶文心：《疏离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和政治，1919-1937》（英文版），1990 年版，第 56 页。

21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78 页。

22 参见顾城在海外所著小说《英儿》及杨炼的诗集《太阳与人》。

23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63 页。

丁凡和何岩红认为,只有“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把自己的创作焦点集中在城市现实、城市的普通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观点上。<sup>24</sup>通俗文学作品对城市现实的处理拘泥于形式和写作技巧上的重复,并且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身上。王蒙在1999年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过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主题焦点的变化——对城市生活的肤浅的描写无疑占据了整个文坛。如果说在同一主题上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并且有精彩的想像的话,那当然好。但就事论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都市小说都是一个调子。更糟的是,他们写的都是千篇一律,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或者是假冒的资产阶级),从一个情感游戏跳到另一个。它们的作者显然是想让读者在他们的小说里看出什么“特殊的意义”,虽然这些文本里没有任何值得理解的东西。”<sup>25</sup>

既然文学在现阶段的中国是由市场经济所驱动的(这在王蒙看来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势头),因为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持在王蒙看来是“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个令人压抑的主题,及其为社会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对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读者群来说,不具吸引力(在西方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在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的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数万万人的生活家园的破坏和精神上的失落,其中的问题不是几十年内能够解决的。根据预测,在今后的二十年里,将有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现有的每一个城市至少要扩大一倍。这就为城市无节制的蔓延和“典型城市”的存在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如果外国资本继续流入的话。

毫无疑问,新加坡就是这个经过周密部署、被严格修改和检验而完美化的“典型城市”的标准,同时它也是一个受到全方位严格控制的、带有儒家理念的社会模式。库哈斯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解构主义模式或者其他任何体面的当代命题(他们会是什么呢?)看来都不会有更大的吸引力。新加坡代表了使这种吸引力为人所需的权威、手段和远见的准确的含量。在新加坡的众多的、我们根本没有听过名字的建筑事务所里,中国的未来正在被设计着。在这里设计的无数个新城市里,摩天大楼是唯一的一个建筑类型。继共产主义的对传统观念的进攻以后,这里将产生第二个、而且是更有效的反机器主义,帮助中国迈进‘理想之国’:这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刨除了一般市场经济的颓废、民主、混乱和西方的残忍。从新加坡折射出来的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心。中国大陆从东到西,将遍布着一座座新加坡城;它的模式将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二十亿人是不会错的。”<sup>26</sup>

---

24 丁凡、何岩红:《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文学》,载《中国文学》(英文版),1999年冬,第5-12页。

25 王蒙:《向大千世界敞开我们的心怀》,载《中国文学》英文版,1999年春,第5-24页。本文的该书引语为本文作者所译。

26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7页。

新加坡是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实证，同时也是装备最完善的控制他们的手段。“这种新建筑模式简直是超现代。那看似各为一体的每一个餐厅都与一个庞大的洗碗机相连接；我们第一次参观那里时，被邀请到控制室去。整个一面墙安装的都是连接着暗设的摄像机的监控器，这使监视者们能够将镜头推向任何一张饭桌，近距离监视每一个橱窗的任何一笔交易。”<sup>27</sup>

由于“典型城市”在最近几十年才发展、壮大起来，它对城市每个个人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上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西方文学也如此），所以现阶段对这一文学表现形式做比较全面、具体的评估还有困难。但是我们可能在刘大鸿的极富艺术性的、结合农民画和宗教题材的媚俗绘画中找到一个反映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的迷惑、失落、焦虑和破裂的更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正是这种陈词滥调，这种当代中国城市普遍感到的焦虑、不安、烦恼，这种捉弄人的颓废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混乱，刘大鸿的艺术即反映，又以其为得意洋洋取笑嘲讽的对象。”

28

再者，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似乎继续在农村生活和文化中寻找合适的坐标和社会批评的标准，张艺谋在1999年接受多伦多《环球报》采访谈到他自己的创作灵感时肯定了这一点。<sup>29</sup>总的来说，这也包括第五代电影导演；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那些正在政治、艺术地位和个人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确定自己位置的第六代电影导演。只要看一下八九十年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电影、文学力作和各个流派的通俗小说，就可以知道，占据这些中国文化人注意力的主题，以及他们赖以吸取灵感、进行社会历史反省和艺术感知建设的，仍然是农村（而不是城市）的生活和文化。

虽然中国的城市（与俄罗斯和苏联相比）在十六世纪就已具规模，但是中国城市本身和中国人对城市生活的体验，仍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未知领地”，“中国学者刚刚开始关注文学和文化中的城市范畴这一极其重要的主题。”<sup>30</sup>另一方面，长期固有的城乡对立和对这一主题的多层次的艺术表现（在对城市的负面描写这一点上不异于西方文学）构成了张英进所说的、现代中国文化想像中的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sup>31</sup>鉴于张英进的研究是现阶段关于这一主题的少有的学术论著，并且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和上海为主，更多的和更全面的、包括港澳台的研究是学界所期待的。

<sup>27</sup> 库哈斯：《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7页。

<sup>28</sup> 白杰明：《赤字：论当代中国文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sup>29</sup> 见多伦多《环球报》，2000年5月5日。

<sup>30</sup>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xix页。

<sup>31</sup>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xvi-xvii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生活的结构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主题。在谈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情况时张英进强调指出在城市发展前提下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社会凝聚力（家庭）的削弱。<sup>32</sup> 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以及该书在 1993 年出版时所带来的争议颇具代表性地表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充斥于中国城市的困惑和混乱。<sup>33</sup> 虽然有些评论家将这本小说及身为作家的主人公庄之蝶看作是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气候的大师级描写”、是“现代石头记”和“旨在召唤全社会反省的、对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大胆揭露”，另一些评论家则将其扁为一个不择手段的雇佣文人的耸人听闻的商业炒作和为追求利润所作的“黄色小说”。该书题目的覆盖面之广包含婚姻、文化、宗教、政治、商业，即整个社会和社会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指逝去的都城）和由其导致的、对社会的威胁。<sup>34</sup>

虽然在这次“堕落”之前贾平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严肃、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北京作家王朔从来就没有把他自己对通俗文学和平民生活方式的挚爱当做秘密。如果王蒙对中国作家的缺乏幽默感到失望的话，在王朔的反映城市下层社会的小说中，幽默，特别是黑色幽默好像取之不尽，即手可得。这一点在中国评论家中引起很大的不安。评论家阎晶明索性将王朔笔下的北京下层青年称为伤风败俗、破坏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社会渣滓”。<sup>35</sup>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王朔的小说在北京青年中极为流行，作家本人也已成为中国城市小说中最重要、最成功、被称为“痞子文学”的反文化的典型。<sup>36</sup> 王朔得意洋洋地坚持他的艺术独立性及其与严肃文学的距离。<sup>37</sup> 王朔的成功，使他的很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他所描写的游手好闲、玩世不恭及其有叛逆心理的年轻人以及他们对社会规范的无视，在很长时间内被看成是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既然痞子代表社会上传播极广的恶性态度和习惯，在很多情况下接近或者构成犯罪，王朔的创作意图充其量也和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困惑和混乱一样模糊、捉摸不定、模棱两可。这一点在由王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中超现实主义的最后一幕的荒诞、滑稽的描写中表现地淋漓尽致。<sup>38</sup> 在这里，西式时装模特、身着戏装的京剧演员、半裸体的女健身运动员、解放军战士、清朝的遗老遗少、红卫兵、警察、工人和农民，在重金属摇滚的伴奏下，同台高歌起

---

32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英文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64 页。

33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 年版。

34 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 页。

35 阎晶明：《顽主与都市的冲突》，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6 期，第 87 页。

36 白杰明：《赤字：论当代中国文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3-64 页。

37 左舒拉：《王朔：一个敢于藐视常规的俗人》，《大众电影》1989 年第 5 期，第 14 页。

38 见米家山执导的影片《顽主》，峨嵋电影制片厂 1988 出品。

舞。这里的背景是毫无疑问的都市背景。在王朔刻意设计的黑色幽默中，崔健歇斯底里地向观众叫唱着流行歌“大千世界”：

我曾梦想着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可现在我的感觉，我不知怎样做。  
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  
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找个朋友在酒馆里随便坐坐，  
录音机里唱着市面流行的歌。  
你是这样想的，你是那样做的；  
人人都戴着一个厚厚的面具，  
你让我怎么做。

这简单的歌词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市人们对生存的理想、矛盾、困惑和无奈的特写。显然在王朔的作品中年轻人对都市生活所抱的、做为进步象征的希望和梦想还无从实现；每个人物的焦虑和不满都象一条红线贯穿于电影的始终，而且并没有因当中的事件、连续不断的滑稽场面和最后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幽默而减轻。

在都市寻找希望和梦想，对千百万人来说，有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但是这种希望和梦想在王朔的另一部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用黑色幽默被一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测所笼罩（象很多西方都市小说一样）——当举国同庆唐元豹在札幌奥运会上夺冠时，整个城市被笼罩在一片巨大的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中，巨大的阴影覆盖着夏日中国城市的上空。但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其他都市叙述，带给读者的结局是比王朔的要乐观，却很有片面性。总的来说，中国文学的都市写作作为文化兴衰的范例，对主题的表现形式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正象普店街工程和小说中的人物对它的各种不同态度和反应一样。

## 参考书目

阿尔弗莱德·多伯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法兰克福乌尔斯坦出版社，1955年版。

艾略特：《荒原》，伦敦费伯出版社，1922年版。

- 白杰明：《赤字：论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白杰明：《王朔与流氓文学》（*Wang Shuo and Liumang ('Hooligan') Culture*），载《澳大利亚中国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2年第28期，第23-64页。
- 戴锦华：《隐形书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Invisible Writi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in the 1990s*），载《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1999年第11期，第31-57页。
- 丁凡、何岩红：《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文学》，载《中国文学》（英文版）1999年冬，第5-12页。
- 弗里兹·朗：《大都会》（*Metropolis*），纽约基诺国际电影制片厂，1989年出品。
- 顾城：《英儿》，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汉堡若沃特出版社，1952年版。
-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仁牟·库哈斯、O. M. A.、毛尔：《小、中、大、特大》，纽约毛纳齐利出版社，1995年版。
- 瑞尼尔·马瑞亚·里尔克（Rainier Maria Rilke）：《毛地日记》（*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M. D. H. Norton 译，纽约：诺顿公司，1945年版。
- 若兹·摩非，《上海：现代中国的关键》（*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 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伦敦海角出版社，1981年版。
- 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 王蒙：《蝴蝶》，载《十月》1980年第4期。
- 王蒙：《向大千世界敞开我们的心怀》，载《中国文学》1999年春，第5-24页。
- 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 阎晶明：《顽主与都市的冲突》，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第87页。
- 杨炼：《太阳与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 叶文心：《疏离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和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约翰·稻斯·帕骚斯：《曼哈顿枢纽》，纽约哈伯出版社，1926年版。
- 詹母斯·乔伊斯：《尤里西斯》，巴黎莎士比亚出版社，1926年版。

张英进：《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结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左舒拉：《王朔：一个敢于藐视常规的俗人》，《大众电影》1989年第5期，第14-15页。

本文作者李侠，哲学博士、文学翻译、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中文专业创始人，二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和翻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文学、电影、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的论著几十篇。